

历代经济变革

得失

吴晓波

著



阅读



信 8080 发送至 10086  
动手机阅读 同步发行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历代经济变革

得失

吴晓波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 / 吴晓波著.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3. 8

ISBN 978-7-308-11626-8

I. ①历… II. ①吴… III. ①中国经济史—研究  
IV. ①F1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24255 号

##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

吴晓波 著

---

策 划 蓝狮子财经出版中心

责任编辑 胡志远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30 千

版 印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1626-8

定 价 42.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88925591

---

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

**孔丘**

《论语·宪问》

史家对以往史实的兴趣，永远与他对当前生活的兴趣连成一体。

**[意大利] 克罗齐**

《作为思想和行动的历史》

青春逝去，光阴荏苒，人届中年；人生苦短，活动范围日蹙。……我只能考虑当代主题。实际上，公众感兴趣、我也感兴趣的只有我们时代的事。

**[法国] 托克维尔**

与友人的信

---

导论	崛起或崩溃，是一个问题//001
研究中国的方法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谁家的“大势”？ //003
	两个研究工具及两个结论//005

第一讲	被严重误读的“士农工商”//014
管仲变法：两千多年前的“凯恩斯主义”	“放活微观，管制宏观”//017
	“盐铁专营”的始作俑者//019
	鼓励消费的异端思想//022
	“以商止战”与和平称霸//023
	中国古代版的“凯恩斯”//026

第二讲	以农立国：第一个在土地改革中尝到甜头//032
商鞅变法：命令型计划经济的鼻祖	军爵制度：打造出世界上第一个平民社会//035
	郡县制度：地方行政制度的政治雏形//036
	强国逻辑：中央集权制度的奠基之人//038
	毛泽东：“百代都行秦政法”//041

第三讲  
汉武帝变法：顶层设计的集大成者

“文景之治”的成就与后果//047  
刘彻：大一统制度的集大成者//050  
产业改革：铸钱、盐铁与酿酒//051  
流通改革：均输与平准//053  
税收改革：告缗令与算缗令//054  
变法造就第一个“半亿帝国”//055  
变法的负面效应及争论//057  
盐铁会议与“桑弘羊之问”//059

第四讲  
王莽变法：第一个社会主义者的改革

变法背景：世族经济威胁中央集权//066  
改革三战场：财政、货币和土地//067  
最惨烈的改革结果//070  
刘秀对世族开战的失败//072  
“桃花源记”的经济学诠释//074

第五讲  
世民治国：最盛的王朝与最小的政府

科举制以及世族势力的式微//080  
李世民解决吏政、兵政之患//082  
关于专营政策的反复与争议//084  
城市经济的空前繁荣//085  
刘晏变法：专营制度的归来//088  
民间工商资本的五条出路//091

第六讲  
王安石变法：最后的整体配套改革

“杯酒释兵权”的政策利弊//098  
宽松与禁榷并举//099  
士绅经济的定型//101  
千年第二回的“延和殿廷辩”//103  
最后一次整体配套体制改革//105  
“改革标本”王安石//109  
“世界时间”里的变法//112

第七讲  
**明清停滞:大陆孤立  
主义的后果**

四大基本制度的恶质化//118  
铁桶阵:对外闭关锁国//119  
散沙术:对内男耕女织//123  
城市化率的下滑//125  
对“自转惯性”的预警//128  
陷入官商泥潭的工商经济//130  
被枪炮打破的“超稳定结构”//133

第八讲  
**洋务运动:缺乏现代性的  
现代化变革**

洋务运动不是一场“迟到的运动”//139  
以铁路为例:发展与稳定的取舍//140  
以轮船招商局为例:国营与民营的取舍//142  
中日对比: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144  
商人与知识精英在体制外“会师”//146  
立宪运动: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的选择//148  
洋务运动的制度性遗产//150

第九讲  
**两个民国:从极度自由  
到“统制经济”**

四个基本制度的全面崩坏//155  
空前强大的民营经济//156  
地方自治的试验//158  
被欢呼回来的独裁者//160  
国民党的经济主张//162  
挤压民间资本的五种办法//165  
1945年之后的经济政策失误//168

第十讲  
**计划经济:从自负到  
自毁的大试验**

上海试验:计划经济的体系雏形//176  
“第一个五年计划”:计划经济的建设模式//178  
七年消灭私营经济//180  
两次自毁性的经济运动//183  
回收土地:政府的三大收益//186  
“文化大革命”:紊乱十年//188

第十一讲  
改革开放(上):没有  
蓝图的改革

第三种社会主义经济模式//193  
增量改革:由农民发动的工业化运动//195  
中央政府的角色:放权与非均衡战略//198  
地方政府的角色:积极参与和冒险支持//201  
“哪里是改革的主战场”//202  
物价闯关:转折点上的“意外失利”//206  
80年代:“一切改革都从违法开始”//208

第十二讲  
改革开放(下):集权  
主义的回归

分税制:从增量改革到整体改革//213  
1998年的“三驾马车”//217  
国有企业的绝地复苏//218  
“大国崛起”与朱氏逻辑//221  
从铁本案到四万亿计划:第六次“国进民退”//223  
发展与公平:2013年的双重困境//227

结语  
回到历史的基本面

一个不容置疑的前提:“统一文化”是一切自由化  
改革的边界//233  
两个永恒性的主题:分权与均富//236  
三个最特殊的战场:国有经济、土地和金融业//238  
四股前所未见的新势力:互联网、非政府组织、  
企业家和自由知识分子//241

跋//245



导 论

## 研究中国的方法

### 崛起或崩溃,是一个问题

关于中国经济变革的争论一直存在,但从来没有像当前这样两极化。

根据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出版的《2050年趋势巨流》(*Megachange: The World in 2050*)一书中的计算,中国经济将在2030年前后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到205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将占全球的20%。<sup>①</sup>《经济学人》的数据与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的计算<sup>②</sup>基本一致。在此基础上,曾经出任美国财政部部长、哈佛大学校长的劳伦斯·萨默斯进而给出了一个历史性的长期结论,在他看来,300年以后的历史书会把冷战的结束作为第三等重要的事件,把伊斯兰世界和西方世界的关系作为第二等重要的事件,而头等重要的事件是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尤其是中国和印度的崛起,以及这些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关系和互动。<sup>③</sup>

---

① 丹尼尔·富兰克林、约翰·安德鲁斯:《经济学人权威预测:2050趋势巨流》,罗耀宗译,天下杂志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版,第217—218页。

② 林毅夫:《解读中国经济》,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9页。

③ 陈晋:《哈佛经济学笔记》,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35页。

对于西方人来说,面对中国经济崛起这一事实,最困难的不是预测和计算,而是如何解释。

2013年1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年届103岁高龄的罗纳德·科斯出版《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一书。在过去几年里,这位当世最高寿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尽管他从未踏上过这个陌生国家的土地,在2008年,中国改革开放30年之际,他自己出资在芝加哥召开中国经济转型研讨会,之后又倾力完成了这部著作。在这本书里,科斯对中国经济变革给出了三个基本性结论:一是“最伟大”,他认同经济学家张五常的观点,认为开始于1978年的中国经济转型是“历史上最为伟大的经济改革计划”;二是“非计划”,“引领中国走向现代市场经济的一系列事件并非有目的的人为计划,其结果完全出人意料”;三是“意外性”,科斯将中国的崛起视为哈耶克“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理论的一个极佳案例。他的这三个基本性结论表明,在现有的制度经济学框架中无法完整地解释中国经济的崛起。<sup>①</sup>

与上述声音相比,另外的相反性意见似乎更为尖锐。

2012年初,同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因准确预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而广为人知的保罗·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发表专栏文章,认为中国经济正在崩溃。他的主要论据是,中国居民消费支出只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35%,更多依靠贸易顺差维系工业的正常发展,更为严重的是中国投资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0%,而其中很大程度上是由不断膨胀的房地产泡沫造成的,这与美国发生金融危机前的情况非常类似。他在文章的结尾调侃:“世界经济已经饱受欧洲金融危机之苦,我们真的不需要一个新的危机发源地。”几乎同时,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也刊载了题为《2012年中国即将崩溃》的文章,认为中国的体制、法律、经济结构、人口结构等问题会成为即将崩溃的原因。

---

<sup>①</sup> 罗纳德·科斯、王宁:《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徐尧、李哲民译,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序”第1页。

在华人经济学家中，长期悲观论颇为流行，不少自由派学者否认中国模式的存在。耶鲁大学的黄亚生教授多次撰文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并不独特”，在他看来，“如果以亚洲各主要工业国经济起飞的不同年份作为出发点来比较，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并不足为奇。无论是中国的成功经验还是发展困境，都不是中国特有的，都可以从世界其他国家的身上找到影子”。<sup>①</sup>

经济学界的两极化分歧不但没有消解中国经济崛起的魅力，反而使之显得更加迷人。当理论和数据都无法给予清晰判断的时候，我想起了约瑟夫·熊彼特的那句名言：“人们可以用三种方式去研究经济：通过理论、通过统计和通过历史。”于是，回到“中国历史的基本面”，从历代经济变革中探研得失，寻找规律与逻辑，也许是一次不错的探险。——这正是本书创作的起点。

##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谁家的“大势”？

每一个中国男孩，几乎都是从《三国演义》开始了解本国历史的。我读书读到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从邻居家的旧书架上捞到一本泛黄毛边、繁体字版的《三国演义》。展卷阅读，罗贯中先生的第一行字就把 11 岁的我给镇住了：“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直到 30 多年后，在书堆里埋头日久的我才突然抬起头来，想找罗先生问几个问题：为什么天下大势必须“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为什么不可以分了就不再合？为什么合了就必定会再分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到底是“中国的大势”，还是“天下的大势”？

这些当然是非常有挑战性的学术问题，美国历史学会会长、中国史专家魏斐德甚至将最后一个问题看作西方历史与东方历史的“区别点”。

---

<sup>①</sup> 郭颀：《黄亚生：“中国模式”并不独特》，《国际金融时报》2011 年 7 月 1 日，第 2 版。

中国与欧洲在早期都是从部落制进化到了城邦制,东方的春秋战国正与西方的古希腊同期。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毕达哥拉斯正在意大利南部传授几何学;孟子出生的时候,亚里士多德是一位 12 岁的翩翩少年。公元前 360 年,东方发生了第一次重要的集权式变法——商鞅变法,西方则在公元前 356 年出现了亚历山大帝国。汉武帝(前 156—前 81 年)进行中央集权制度的试验时,西方的凯撒大帝(前 102—前 44 年)也让高度集权的帝制替代了共和制。从公元前 2 世纪到公元 3 世纪,东西方世界分别出现了双峰并耸的、大一统的大汉王朝与罗马帝国。公元 184 年,汉帝国陷入内乱,之后进入了将近四百年的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罗马帝国也在外族的侵略下分崩瓦解。之后,东西方历史突然开始了“大分流”。中国在公元 589 年重新实现了统一,从此再也没有长期分裂过。而欧洲进入黑暗的中世纪,经历了漫长的封建制时期,便再也没有统一过,尽管在 2000 年出现了欧元,实现了货币意义上的“统一”,可是在 2008 年的金融危机之后,欧元的存废又成了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魏斐德的问题正是:“在世界上第一批帝国——罗马和汉朝——崩溃后,中国历史和欧洲历史为何差异起来呢?”

这似乎是一个很难有标准答案的历史悬案,你尽可以从地理条件、民族心理、宗教语言以及偶然性等角度来给出解释。魏斐德给出的答案很简洁,但在在我看来却像手术刀一样精准,他说,“统一是中国的一种文化”。<sup>①</sup>

统一的文化为中国赢得了历史性的荣光,在《历史研究》一书中,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称中国为“唯一延续至今的社会”,根据他的统计,人类历史上出现过 21 个文明社会,其中,中国社会是文明特征保留得最为完整的样本。而这一成就正得自于“统一的文化”。

中国人最害怕、最不愿意、最讨厌、最不能容忍的事情,就是“分裂”。统一是一个宿命般的、带有终极意义的中国文化,是考察所有治理技术的边界,尽管

---

<sup>①</sup> 魏斐德:《讲述中国历史》,梁禾主编,东方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9 页。

统一本身并不能保证政治和经济的发展,甚至连汤因比都无法确认统一到底是“目的本身”,还是“达成目的的手段”,不过他确定地认为:“大一统国家的成功崛起最终终结了‘乱世’,亲身经历了这一过程的一代人对于大一统国家自然是无比向往、感激涕零。”<sup>①</sup>

任何选择都有代价,统一也不例外。若将这个汉字组合拆解开来,“统”者“归总”,“一”者“划一”,这个词的背后隐隐约约地站立着三个让人望而生畏的“怪物”:集权、独裁、专制。这似乎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你别无选择。

## 两个研究工具及两个结论

在一个疆域辽阔、人口众多、民俗纷杂的地区维持长期统一,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治国者必须在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分配和基本制度建设上有卓越的智慧,由此,我得出了两个观察和分析的工具。

**首先是四大利益集团博弈法。**我认为,发生于历史以及当下的所有中国问题,都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有产阶层和无产阶层,这四大利益集团互相争斗、博弈和妥协的结果。

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
无产阶层	有产阶层

四大利益集团格局图

**其次是四大基本制度分析法。**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最独特之处在于,我们是唯一保持了两千年中央集权制度的国家,也是当今世

界上前三十大经济体中唯一保持这一制度的国家。这种中央集权、大一统的国家模式并非一日建成,它经历了一个漫长、血腥和充满探索的过程。对于专制

<sup>①</sup> 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下卷)》,郭小凌、王皖强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9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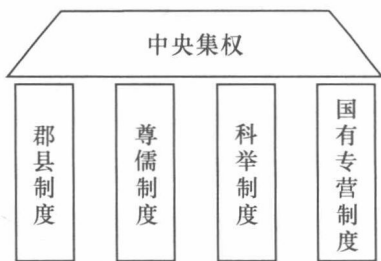
者来说,想要维持集权统治,必须在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模式、全民思想的控制模式、社会精英的控制模式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宏观经济制度模式这四个方面完成制度建设。中国历史上的众多制度创新,从本质上来说,都围绕着四大基本制度而展开。在前工业文明时期,它们分别呈现为——

**郡县制度**:为了保证帝国的稳定,在政治上必须保证中央的人事任命权,避免地方割据势力的滋生;

**尊儒制度**:扼杀“百家争鸣”的学术传统,以实现全民在意识形态上的大统一;

**科举制度**:通过公平的考试制度,将社会精英吸纳到体制之内为我所用;

**国有专营制度**:在经济上,实行重要资源的国营化垄断,以控制国计民生。



中央集权与四大基本制度

这四个基础性制度,如四根“支柱”共同支撑起集权政体的“大厦”,它们的共性就是追求各个利益集团在行为及思想上的一致性,维持“自上而下的控制”。历经上千年的打磨和探索,这些制度日渐趋于精致完善,在明清时期达到巅峰。如梁启超所言:“中国为专制政体之国,天下所闻知也。虽然,其专制政体,亦循进化之公理,以渐发达,至今代而始完满。”<sup>①</sup>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实在是大一统制度的“故乡”。及至于近当代,中国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开始了艰难的现代化转型,上述四大制度中的很多内容都发生了重大改变,但是,维持大一统、实行威权治理的基本理念无实质性变更,因此,制度创新的目标与手段依然

<sup>①</sup> 梁启超:《李鸿章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8页。

共轨同辙,体现出鲜明的延续特征。对于面向未来的中国变革,此乃最为严峻的命题之一。

本书正是沿着历史的脉络,以经济制度的变革为核心主题,做一次跨时空的平铺直叙。

在第一讲和第二讲中,我将讲述中国在完成大一统之前的两次重要变法——公元前7世纪的“管仲变法”和公元前4世纪的“商鞅变法”,管仲的“四民分业”思想、盐铁专营政策以及商鞅在土地私有化、郡县制、户籍制、军爵制上的大胆试验,皆具开创之功,它们分别提供了两个颇为极致的治理模型,如同左右极般地站在后世历次变革的两端。

第三讲“汉武帝变法”是一个重点,在这场长达半个世纪的大变革中,中国完成了帝国模式的建设,汉武帝倡导“独尊儒术”奠定了全民思想控制的基本模式,他围绕产业、流通、货币及财税等核心经济命题,施行了史上第一次整体配套体制改革,其颁布的诸多经济政策为后世所借鉴仿效。第四讲的“王莽变法”,是一位儒生皇帝对汉武帝的极端化模拟,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也是非常短命的古典社会主义试验。

第五讲和第六讲,分别讲述中华文明史上最繁荣鼎盛的两个朝代——唐朝和宋朝的政治经济变革。唐太宗以史上最小之政府造就最强之帝国,开创了盛极一时的“贞观之治”,然而130年后,制度上的缺陷使唐朝难逃“安史之乱”的劫难。宋太祖果断地剥夺了地方藩镇的权力,化解了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权威挑战,有宋一朝在经济制度上的创新为历代之最,北宋后期的“王安石变法”更是一次转折性事件,是帝制时期的最后一次整体配套体制改革,东西方文明也在此时分道扬镳。

第七讲“明清停滞”试图回答这些问题:为什么在经历了上千年的发展后,中国会掉进长达500年的“高水平停滞”陷阱;明清两朝的闭关锁国政策是一次胆怯的被动行为,还是自信的主动决策;中国人在经济创新和科技创新上的能力退化是怎么发生的;“男耕女织”的社会经济形态是如何形成的。

从第八讲“洋务运动”开始，中国以“东亚病夫”的姿态被拽入全球化洪流，重新驶上积极变革的轨道，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输入式改革，其过程痛苦被动，耗尽一代精英的心血。晚清的洋务运动与日本的明治维新几乎同时起步，却造成完全不同的国运结局，期间发生的两次“国进民退”事件值得后人警惕。

第九讲“两个民国”提供了两个从理念到模式均南辕北辙的变革样本，一个是极度自由放纵的市场经济运动，另一个是以“统制经济”为名义的集权变革，无一例外的是，它们都以失败告终。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在这一时期实际上已陷入进退维艰的闭环型矛盾之中。

第十讲、第十一讲和第十二讲是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变革简史，1949年之后的20多年间，进行的是一场意识形态气息浓烈、以消灭私人资本为目标的计划经济大试验，它曾经取得过辉煌的经济成就，然而最终将中国拖进了一个停滞混乱的泥潭。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则又分为“放权让利”和“集权回归”两个阶段，中国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体制上的种种羁绊又让改革的长期前途显得扑朔迷离。

上述十二讲，始于遥远的公元前7世纪，止于当下的2013年，漫长的叙述宛如一次疲倦的旅行，对于写作者和阅读者都是一次智力、体力考验。在闭门创作的日日夜夜里，我常有与古人对弈复盘的感慨，有时一起欢愉，有时一起快意，有时一起沮丧，相与辩驳，东西参详，终于体会到钱穆所谓“对古人怀有温情与敬意”的心境。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尝言：“关于政治经济、经济发展、经济时代问题，都要理解决策者背后的思想模式和意识形态。所谓的意识形态，就是一群人对环境的解释，以及对该环境如何调理出秩序，所提出对策背后一套共有的思想模式。”在这本书中，我放弃了批判者的姿态，而更希冀以建设性的理性心态，探研本国的历史轨迹及可能的前途。也因此，我在十二讲之后，又增写“回到历史的基本面”一节，就“统一文化”、政治体制改革以及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思考，同时，为未来的中国经济变革提供一些



基础性的判断。

在这本书中,我将提出两个也许会引起争议的结论:第一,最近三十多年的经济大崛起与其说是“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倒不如说是两千年经济变革史的一次合理性演进,我们迄今仍有陷入历史的闭环逻辑的危险;第二,中国经济制度上的“结构性缺陷”,是一个“建设性结果”,它与维持千年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度有密不可分的重大关系。